

#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5)

[摘要]《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能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关键词]《刘向歆父子年谱》 钱穆 顾颉刚 经学 史学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05)02-0046-09

经史之学乃钱穆先生一生用力之所在。对于钱先生以史学之法治经学所取得的成就,近年来已有些学者作过论述,<sup>①</sup>但相对缺乏从个案入手深入细致的讨论。<sup>②</sup>本文拟以钱先生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为个案,通过对这部著作的学术背景、主题意旨、各方反响等的分析,尤其通过研究顾颉刚先生与钱先生围绕此著所生之论争,系统探讨钱先生在清末民初今古文纷争大背景下,于早年形成并终生抱持之“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的史学理念。

众所周知,钱穆先生非学院出身,基本是以自学为主走上经史研究之路。民元前后,他对经史之学开始涉猎。他曾细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中了解到“经学之有今古文之别”,<sup>③</sup>后来随着学力加深,对经学问题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1919年后,他读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经过多年

[收稿日期] 2004-10-28

①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传记类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以及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有关论述。另外在评述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的论文中也有相关论述,如罗义俊《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廖名春《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述评》(《原道》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勇《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等。

② 个案入手的讨论并非完全没有,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该文经修改后又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钻研,与各家学说比照和独立思考,“深病其抵牾”;<sup>①</sup> 怀疑其准确性。1929年夏,顾颉刚先生自广州北上赴燕京大学任教,欲以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主要讲授对象,钱穆得悉后,便将已完成的直斥康氏《新学伪经考》之误的长文《刘向歆父子年谱》交给顾颉刚,“不啻特与颉刚争议”。<sup>②</sup> 顾氏胸襟宽阔,不以为忤,将其发表在1930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后又编入《古史辨》第五册中。<sup>③</sup>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多年潜心于经史研究的一个成果。在这篇奠定其学术地位的长文中,钱穆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基本是根据《汉书·儒林传》及与此相关的大量史料,梳理出从西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刘向出生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歆、王莽死亡为止的经学史实,逐年排列,将各家各派师承之家法和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以及诸经博士间的意见分歧,都源源本地凸显出来,从而廓清了经学史上的迷雾,以有力证据证明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具体说来,不通之处有二十八端。概括起来,这二十八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从时间上看。“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诸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谓歆遍伪诸经,非一时之事,建平以下,迄于为莽国师,逐有所伪,随伪随布,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不可通三也。然则歆之遍伪诸经果何时耶?”<sup>④</sup>

第二,从伪造手法和旁证看。首先,钱穆设问,刘歆遍伪诸经是一手伪之,还是借群手伪之?“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当时被王莽征入朝廷的通经学者有数千人之多,“谓此诸人尽歆预布以待征,则此数千人者遍于国中四方,何无一人泄其诈者?自此不二十年,光武中兴,此数千人不能无一及于后,何当时未闻有言及歆之诈者?”其次,钱穆认为找不出刘歆造伪的旁证。当时与刘歆同校五经者非一人,像尹咸父子、班固、苏竟等都是有名的经学家,尹氏父子位在刘歆之上,苏竟为人正直,东汉初尚在,他们都没说刘歆造伪,而且苏竟对刘歆还相当推崇。扬雄也曾校书天禄阁,这是当年刘歆校书的地方。如果说刘歆造伪经,“于诸经史恣意妄窜,岂能尽灭故简,遍为更写?伪迹之昭,雄何不见?”另外,“稍前如师丹、公孙禄,稍后如范升,皆深抑古文诸经,皆与歆同世,然皆不言歆伪,特谓非先帝所立而已。何以舍其重而论其轻?”<sup>⑤</sup> 可见说刘歆造伪经是缺乏证据的。

第三,从伪造目的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服务。钱穆则指出,刘歆争立古文诸经时,王莽刚好辞职,绝无篡汉动向,说刘歆伪造诸经为王莽篡权服务是没有根据的。在诸经书中,康氏指称《周官》为刘歆伪造以献媚于王莽的主要经书。钱穆考辨道,刘歆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包括在内,此后是王莽根据《周官》以立政,并非刘歆依据王莽改制以造《周官》。当时取媚王莽以助篡者首在符命,“符命源自灾异,善言灾异者皆今文师也。次则周公居摄称王,本诸《尚书》,亦今文说耳。歆欲媚莽助篡,不造符命,不言灾异,不说《今文尚书》,顾伪为《周官》。《周官》乃莽得志后据以改制,非可借以助篡,则歆之伪《周官》,何为者耶?”<sup>⑥</sup> 另外,康书说刘歆伪造《周官》前,已先伪造《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钱穆问:即便《周官》是为献媚王莽,那么伪造《左氏传》诸经又是为了什么?若说为了篡圣统,则刘歆虽为国师公,被王莽尊信,

①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朴社1935年版,第106页。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2页。

③ 《刘向歆父子年谱》原名为《刘向刘歆王莽年谱》,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学报》发稿前改成此题的,顾先生还对钱穆原稿作了细致的编辑加工。参见顾洪:《记顾颉刚先生收藏钱穆先生的一份手稿》,《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247页。

④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101、102页。

⑤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102、103页。

⑥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103页。

但同时朝中六经祭酒、讲学大夫不少出自今文诸儒，而且王莽立制，《王制》《周礼》兼举，刘歆议礼，亦折中于今文，这显然与篡圣统说不符。总之，从目的上看，认为刘歆编造伪经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从经书渊源和内容看。“《左氏》传授远有渊源……歆以前其父向及他诸儒，奏记述造，引及《左氏》者多矣。《左氏》自传于世，不得尽谓歆伪。……至《周官》果出何代，《左氏》《国语》为一为二，此非一言可决，何以遽知为歆伪？”<sup>①</sup>即在钱穆看来，《左氏传》早在刘歆之前既已存在，渊源久远，绝非刘歆伪造。《周官》等书的问题，也非一言可决，不能简单得出刘歆伪造的结论。再从经书内容看，今文经中五帝无少皞，刘歆古文中则有；今文五帝前无三皇，刘歆古文则有之；今文天下惟九州，无十二州之说，刘歆古文则有之。但刘歆之说，断断不始于他，先秦旧籍载刘歆之说颇多，故该说并非他伪造。而且“必以今文一说为真，异于今文者皆歆说，皆伪，然今文自有十四博士，已自相异。”<sup>②</sup>

总之，钱穆认为，无论从时间上、从伪造手法和旁证上看，还是从伪造目的、从经书渊源和内容上看，都不能得出刘歆遍伪诸经的结论，即不存在刘歆在数月之间掩尽天下耳目编造经书的事实，自然也不存在造经为王莽篡权服务之事。至于康有力为主刘歆造伪之说，纯是为其托古改制的目的而杜撰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作，当时的硕学通儒对它大都推崇备至，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就称誉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sup>③</sup>钱穆的学术地位由此而奠定，随即由刊发此文的顾颉刚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开始了人生和学术的重大转折。钱穆到燕京大学后，“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按指《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sup>④</sup>

钱穆之所以凭《刘向歆父子年谱》在学术界一亮相即获巨大成功，不仅是因此文廓清摧陷，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确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因它触及了当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经今古文之争。清末康有力为主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尽管当时即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大力反驳，但双方的争论显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钱穆登上学术舞台之时，这仍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事情，学者头脑中大都还有古文经是否刘歆伪造、《周礼》《左传》等书是否伪书的疑问。故而钱穆以详实证据一举摧破康说，不能不在学界引起震撼，“使人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了出来”，“使晚清以来有关经今古文的争论告一结束”，<sup>⑤</sup>意义不可谓不大。不过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评价仅限于此恐怕还不够，要深入评价钱穆的这一贡献，探讨钱穆何以会有此成就，须于经史之学的深层再做文章。

## 二

在中国传统学问里，经史之学占有主导地位，经学更是处于核心位置，这从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次序便可看得很清楚。当然，经史两学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清末，经史两学的关系问题比以往引人瞩目。反映经史关系的“六经皆史”说此时被章太炎所大力倡导。“六经皆史”表达的是经等于史的观念，这一说法早就存在，清人章学诚曾作过系统条贯的论述，龚自珍亦曾有过深入阐发，章太炎则在前人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表述得更彻底。他说：

①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105页。

②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106页。

③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④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160页。

⑤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序、《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134页。另，余英时外，其他学者对《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贡献也有类似评价，大致已成共识。

“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sup>①</sup> 研究经学是为了弄清古代历史实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sup>②</sup> 章太炎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要比康有为来得大。<sup>③</sup> 故他的“六经皆史”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响应，如刘师培便极为认同，这非常有助于人们关注史学，促进史学地位的上升。实际上，清末之时史学的地位确是大大提升了，史学革命或曰新史学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及在社会上的巨大反响，即已表明此点。相对而言，经学稍显沉寂，尽管有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所谓今古文学之争，有孙诒让、廖平、皮锡瑞等人的经学著作陆续刊行，但毕竟康、章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披着经学外衣的政争，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孙、廖、皮等人的著述也无新史学著作那样的效应，不再像以往经学中心时代那样处于学术舞台的核心位置。所以，应该说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由经学转向史学。<sup>④</sup> 进入民国之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被视作旧文化、旧学术代表的经学更是一落千丈，“新派学者望而却步，引不起他们的兴味。”<sup>⑤</sup>

到钱穆登上学术舞台之时，正统意义上的经学已经分崩离析，其内容分解到现代人文社会各学科中，大学里“经学史”、“经学通论”诸课的开设，也仅是从知识层面进入，非传统的经学教育可比。但经学并未就此终结，经学中的问题仍在困扰着学术界，经学研究的思维惯性也仍在规范着很多学者，今古文门派、家法观念还未从学者头脑中彻底屏除，以至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却被怀疑为是“主古文家言”。此种情形表明，尽管经学已非旧观，但有关经学问题的研究还是关联着学术命脉——现代中国学术如何真正从经学中走出来。从这层意义上再看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其贡献与价值便非可以简单估量了。

前已指出，《刘向歆父子年谱》完全依据史实而编撰，具体说来是依据《汉书》记载，把当时的五经异同、诸博士的意见分歧一一梳理，源源本本地指出各家各派师承之家法及各经师论学之焦点所在，使人就此对两汉经学历史有明晰的了解，从而明白《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妄，即“事实既列，虚说自消”，“庶乎可以脱经学之樊笼，发古人之真态矣。”<sup>⑥</sup> 所以这是典型的以史学治经学的作品，绝非传统经学所能笼罩。钱穆这样做，是基于他研治经史之学的基本观念——“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需“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sup>⑦</sup>

经学与史学，治经与治史，内涵不同，路径亦有差异。治经者往往有求“道”的意念，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sup>⑧</sup> 而治史者则旨在求真，就像钱穆谈其以史治经之作《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时所言：“本书之所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惟真相显，而后伪说可以息，浮辨可以止。”<sup>⑨</sup> 有此不同，所以评价《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样的著作便不能不超越经学窠臼，以“史学立场”为准。即钱穆已然把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用史法治经学，那么就不能再依经学传统或今古文之类门派标准来判断这部著作的价值，而是要完全摆脱经学束缚，一依史学标准。按此标准，这部著作所取得的成就自是相当高，它的史料充分，考核精当，“论证是建立在坚强的历史事实上”，<sup>⑩</sup> 从而令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公案得以彻底破解。

① 独角：《论经的大意》，《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1910年4月9日。

② 章太炎：《与某论朴学报书》，《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5日。

③ 参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④ 参见拙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1页。

⑤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

⑥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106页。

⑦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⑧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⑨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7页。

⑩ 余英时：《〈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34页。

进而言之,把经学问题视为史学问题,“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还在深层次上解决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化解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二是对“六经皆史”之成说有所突破,为中国现代史学开辟了道路。

清人治学,最讲门户,但最大的门户——经今古文学之门户,却是直至晚清才确立,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sup>①</sup>此后学者或尊今抑古,或尊古抑今,莫不以廖平所分之门户为门户,章太炎、刘师培、康有为、皮锡瑞等经学大家皆如此。正因学者头脑中一直存有今古文门户之见,所以当钱穆以《刘向歆父子年谱》力攻今文经学之非时,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家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sup>②</sup>怀疑他“主古文家言”。实际上,作为史学家,钱穆绝无站到古文经学立场上申古抑今的用意,他的目的是要以“史学立场”,彻底破除晚清以降的经今古文学之门户。在他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晚清经师主观臆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之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之相异而已。”为了维护门户之见,“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其所欲建立之门户者,则胥以伪书伪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sup>③</sup>要把这种局面彻底纠正过来,惟有不带任何偏见,完全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将历史真相揭示出来,方能达成目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令人们头脑中的经学门户得以破除,从而使经学或经学史的研究摆脱经师习气,超越“通儒”立场,<sup>④</sup>走上规范的现代学术之途。

在经史两学关系的问题上,章太炎在前人基础上所大力倡导的“六经皆史”说,清末民初已然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响应,钱玄同、顾颉刚等学者自接受“六经皆史”的观点后,一直信奉它,钱穆对章氏的“等贯经史”至少也是认同的。<sup>⑤</sup>当然,如何理解“六经皆史”,各人看法相异。清末章太炎主张“六经都是古史”,夷经为史,固然是出于史学经世的用意,<sup>⑥</sup>同时也是出于破除经学统治地位、建立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需要。而到了民国年间,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周予同等人再论“六经皆史”时,却已是将六经视为史料了,就像周予同所明确指出的,“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sup>⑦</sup>对于“六经皆史”,钱穆有其独到见解,即在章学诚倡此说的原初意义上,他不赞成“六经皆史料”。<sup>⑧</sup>但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等一系列著作和他的撰述宗旨看,

① 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载张岱年等《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② 青松:《评〈刘向歆父子年谱〉》,《古史辨》第五册,第250页。

③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5、6页。

④ 一些经学家不主门户,看待某些经学问题时不受今古文窠臼制约,自谓“通儒”。但自史家看来,他们仍各有其经学立场,未能完全超越自身立场总结经学史。

⑤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可参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一文对此所展开的议论。

⑥ 有学者认为,与章学诚倡“六经皆史”相比,章太炎等人再倡此说时立意已有所不同。章学诚“虽有经史并列之心,其基本立意还是希望提高史学(到近于经学)的地位”,章太炎等人虽也认同此点,但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情势下,史学“荣其国家,华其祖宗”的功用较平日凸显,“随着历史对国家兴衰重要性的增加,‘六经皆史’说的社会学意义也与前大异。”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⑦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2页。参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第732~735页。

⑧ “实斋(按即章学诚《文史通义》)倡‘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嗚呼!此岂章氏之旨哉!”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0、433页。

他的某些观念又与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周予同等人并无根本区别。如前所述,他是把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一依史学标准,用史法治经学的,既然如此,经学记录在他那里便转为史学记录,经书也便成了史料。从夷经为史到“六经皆史料”,经学又一次下跌,独立地位不保,表明现代学科体系已形成,经学不再是为首的学科,而且已经分崩离析,其内容为人文社会各学科所分解,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些古老的内容自是应属史料。当然,换个思路予以分析,也可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因其颠倒了经史位置,逆向操作,反过来以史证经,仅用《汉书》等常见史料,即解决了经学上的大问题,最终达成以史御经的目的。这样,在经史关系上,乃至在史学研究上,一条新的道路被开辟出来。此后,遇到经学上的问题时,学者大率是追步钱穆,以史法治之,从学术史角度考察,成就愈益丰厚,一迄于今。

### 三

《刘向歆父子年谱》虽由顾颉刚经手发表,但对这篇直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的长文,顾氏并不认同,还就有关问题与钱穆进行了讨论。

顾颉刚1913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后,曾在国学会听章太炎讲学,觉得章的学说很有道理,产生“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妄人”的看法。但不久之后,他又读到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又觉十分敬佩,认识到“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sup>①</sup> 数年后,顾颉刚对章太炎的崇敬之心更降低了,相反由于受胡适授课内容的影响,益发信服康有为了,认为“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sup>②</sup> 康有为的著作本是为变法改制提供依据的政治性极强的经学著作,并非严格的史学研究之作,但在此时的顾颉刚眼里,却是启发他推倒旧古史、查出伪史背景的史学专著。当然顾氏也清楚康氏著作有相当复杂的背景和政治动机,说康是“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故“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sup>③</sup> 所以他是取康氏的结论而非手段,并认为自己的辨伪工作才是手段与目的一致的工作。在《古史辨》中,他受今文经学“疑古惑经”的启发,怀疑经书,进而辨析古史,欲拨开古史“茫昧无稽”的迷雾,恢复古史的本来面目。就像有学者所言:“《古史辨》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煞’上古史的精神——在还没有逐步的检视每一件史事(或大部分重要史事)前,就先抹煞古书古史。而这个精神主要便是承继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观而来的。”<sup>④</sup> “正因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使得顾颉刚在一开始就全盘否定上古信史。”<sup>⑤</sup>

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思想在今古文两家中主要取法于今文,尤其是取法于康有为的观念,所以他对钱穆直斥康氏《新学伪经考》之非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并不赞同。于是,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表达了与钱穆相左的看法。<sup>⑥</sup>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前十三节基本是用五德终始说讲五行说的起源和发展,其中已杂入不少今文家说,从第十四节开始专门谈今古文问题。从顾氏的具体论述来看,他相信《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传》都是刘歆伪造或改造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版,第26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78页。

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43页。

④ 王震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17页。

⑤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5页。

⑥ 按顾颉刚是于1930年2月至6月,应杨振声先生之邀,为《清华学报》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该文初刊于1930年6月《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与《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布几乎同时,但写作时间比《刘向歆父子年谱》晚几个月。胡适曾说:“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册。

的,这显系袭自康有为的观点。所以他的结论是:“其实所谓古学何尝是真的古学,只不过是王莽所需要之学,刘歆所认为应行提倡之学而已。康长素先生以‘新学伪经’名书,这是很不错的。”<sup>①</sup>“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正确的。”<sup>②</sup>可见,顾颉刚在论及今古文问题时,是同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的结论的,明显站在钱穆对立面,维护康氏旧说。

应顾颉刚之请,钱穆在读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后为其写了一篇评论。在评论中,钱氏指出,顾颉刚“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那篇论文,便是一个例子。无论政治和学说,在我看来,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而今文学家的见解,则认为其间定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改换。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sup>③</sup>接着钱穆考察了顾氏文中的一些例证,并在大量论据基础上得出与顾氏相反的结论。最后钱穆概括己意,重申“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刘歆、王莽一切说法皆有沿袭,并非无端伪造。”“顾先生原文所引各种史料及疑点,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不必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于刘歆一人。”<sup>④</sup>

钱穆说顾颉刚的论断可用历史演进和传说流变加以说明,不必尽如今文家说归之于刘歆一人所造,这确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因运用历史演进和传说流变的眼光来研析历史,恰是顾氏所长,顾若弃置其长,难免有失。但顾本人对此问题并不这样看,在读了钱穆评文后,他随即写了一篇跋文,申说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的历史考证,固然有些地方受了家派的束缚,流于牵强武断,但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刘歆一个人,年寿有限,精力有限,要他伪造许多书自然不可能,但这个古文学运动是他于校书后开始提倡的(见本传),是他于当权后竭力推行的(见王莽传),这是极明显的事实。在这个利禄诱引之下,自然收得许多党徒,造成一种新风气,自然他们所目为乖谬的都得正,所目为异说的都得壹,而学术于是乎大变。所以刘歆虽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人,但他确是改变学术的领袖,这个改变的责任终究应归他担负。清代今文家在这一方面,议论虽有些流于苛刻,而大体自是不误。”<sup>⑤</sup>显然在顾氏看来,相信清今文家的历史考证与钱穆所言用历史演进和传说流变说明问题并不矛盾,只要清今文家的历史考证大体不误,就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历史资料。可见顾的基本见解未变,没能接受钱穆的批评。

从钱顾之辩可以看出,两人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讨论经学问题。钱氏自不待言,顾氏维护康有为旧说,也非为相信今文家说,“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曾表明:“我们所以在现在提出今古文问题,原不是要把这些已枯的骸骨敷上血肉,使它重新活跃在今日的社会,只因它是一件不能不决的悬案,如果不决则古代政治史、历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字史全不能做好,所以要做这种基础的工作而已。”<sup>⑥</sup>针对有些人因其发表了一些不信任古文家的文章而将其视作“新今文家”的议论,他的回应是非常明确的,说:“我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只是西汉末的一幕今古文之争,我们必得弄清楚,否则不但上古史和古文籍受其纠缠而弄不清楚,即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的也要被它连累而弄不清楚了。这种难关是逃避不

①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533、534页。

②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537、538页。

③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621页。

④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630页。

⑤ 顾颉刚:《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631、632页。

⑥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古史辨》第五册,第3页。

了的。”<sup>①</sup>很显然,他把讨论经学问题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不厘清今古文之争,中国历史的重重迷雾就无法拨开,他主观上绝无经学家的家派观念。

对于顾氏的不受家派束缚和超越今文学,其论争对手钱穆也看得十分清楚。钱曾分析了《古史辨》所以产生的缘由,认为顾的学说“自然和晚清的今文学未可一概而论”,“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而且他还引用胡适的见解,指出顾之学说与康有为今文学的区别,说:“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的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而康有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却说是孔子托古改制,六经为儒家伪造,此后又经刘歆、王莽一番伪造,而成所谓新学伪经。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我们把顾先生的传说演进的见解,和康有为孔子改制新学伪经等说法两两比较,似觉康氏之说有些粗糙武断,不合情理,不如传说演进的说法较近实际。”<sup>②</sup>钱穆不满意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的基本结论,恰恰在于他认为顾氏在一些问题上过于相信今文家的说法,而没有运用自己所擅长的传说演进的见解与方法。

可以说,由《刘向歆父子年谱》所引发的钱顾之辩,核心问题虽仍是经今古文问题,但从争论双方所持立场和主张看,已非传统的经学之争,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之争。双方所信服者都是各自所认可的历史考证结果,即便这一结果与今古文家的某些结论相合,但基本着眼点已是大相径庭。若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相较,更能看出这一争论的时代特性。康章之争尽管带有浓厚政治意味,毕竟还是一场经学争论;而钱顾之辩则既无政治色彩,又非经学论辩。<sup>③</sup>这至少表明时代语境和学术主题已转换,经史之学走上了现代轨道,就像顾颉刚之所言:“从前人治学的最大希望是为承接道统,古文家所以造伪经者为此,清代的今文家所以排斥伪经者也为此。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打破这种‘求正统’的观念而易以‘求真实’的观念了。”<sup>④</sup>这种围绕古老经学问题而展开的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不仅为此类问题的研讨树立了典范,而且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中国史学摆脱政治化倾向,在学术道路上健康前行奠定了基础。

进而言之,通过考察钱顾之辩,还可深入地看清钱顾二氏相近又相异的史学理念。《刘向歆父子年谱》经顾颉刚之手发表,后又为顾氏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中,这似乎意味着钱穆与古史辨派的某种关联,具有象征意义。钱穆本人也曾申明,自己的主张是“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家的一道防线(其实还是晚清今文学家的防线),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展进一步。”<sup>⑤</sup>到了晚年,他又自谓:“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sup>⑥</sup>应该说,在把经学问题作为史学问题,汲汲于史学求真方面,钱、顾二人是颇为一致的,

① 顾颉刚:《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632页。

②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620页。按王澐森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50~51页中曾引用钱穆这段话以说明顾颉刚“古史辨”派“把无意的积累与有意造伪等同”,实则钱氏这段话旨在说明顾是重传说的经历和演进的,传说主要是无意的演进生长,而康有一派人才是重刻意伪造之说的,两者区别很大。

③ 当然,顾颉刚、钱穆之辩之于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具有一种承继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刘家和在回顾《左传》成书时代与作者问题的讨论时所指出的那样,《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发展刘逢禄、康有为说的代表作”,“而发展章太炎说的则是钱穆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见刘家和《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④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古史辨》第五册,第258页。

⑤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630页。

⑥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167、168页。

“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钱穆语），“打破……‘求正统’的观念而易以‘求真实’的观念”（顾颉刚语），此类表述，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治学目的相同，不等于其它方面也都一致，钱穆“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的说法，即能令人察觉此中端倪。<sup>①</sup>实际上，早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时，他就明确表示过不能赞同疑古，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sup>②</sup>后来他在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两人才性所异则所得亦各有不同。……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入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拓，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sup>③</sup>可见两人在治学取向和风格上，是有较大差异的。仅就《刘向歆父子年谱》而言，钱穆确乎是以“考古”的态度和精神，孜孜于原始文献，一步步考出康有为之说之误；而顾颉刚不认同钱说，则是出于古史辨派与今文经学“疑古惑经”一脉相承的思想联系，从而相信今文家的历史考证所致。他们的目的皆为拨开经学迷雾，探求史之真相，但切入点和研究取向明显有异。若进一步考察，还可看出钱穆是在总体上非“疑古”的宏观视野下，于具体微观领域“疑”而“考”之；<sup>④</sup>而顾颉刚则在“疑古”的大思路下，对前人的某些具体论断信而采之。两人皆有“疑”，但所疑方向不同，显示出史学理念上的差异。

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应该说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事实也证明，他们从各自方向所作出的努力，确为此贡献良多。

① 有学者认为：“把 20～30 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见陈勇：《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学术月刊》2000 年第 5 期。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 163 页。

③ 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3 页。

④ 何兹全先生曾指出，《刘向歆父子年谱》“是一篇考订精密而有创见的专题著作，是一篇对历史问题的微观著作。但这篇文章也显示钱先生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他从对刘向、刘歆父子一生经历的精密考订入手，却在解决今古文经的一个大问题——刘歆是否伪造了诸经。”见何兹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7 页。

## Qian Mu's Idea of Historical Studies as Seen in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u Xiang and Liu Xin*

Li Fan

[Abstract]: With valid evidence, Qian Mu proved the opinion that Liu Xin forged the classics, mainly supported by Kang Youwei and also debated strongly in Classics Studies, was not true in his *Chronological Life of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which made him become famous. This academic achievement not only exceeded the studies of ancient classics but also transformed the classical problem into the historical problem by breaking drastically sectarian bias of Classics Studies and the limits on “all the classics are histor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problem on Classical Studies is also on history study.” Qian Mu and Gu Jiegang had some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about *Chronological Life of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and related problems. Although involved some old question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ese discussions were normally academic and differed from the political discussions between Kang Youwei and Zhang Taiy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far as Chinese History was concerned, these discussions, including both Qian Mu's “belief with suspicion” and Gu Jiegang's “suspicion with belief”, aimed at the same goal and benefi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w history.

[Key words]: *Chronological Life of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Qian Mu Gu Jiegang Chinese History Classics Studies